

日藏白文无注古钞《文选》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高 薇

内容摘要:发现于敦煌、吐鲁番、日本等地的《文选》白文无注写、钞本是反映萧统所编《文选》原貌的珍贵文献,其中尤以日本所藏九条本与古钞二十一卷本最为重要。本文通过回顾《文选》白文无注写、钞本的研究现状,发现日藏白文无注本在学界的运用有不断扩大之势,但通过其来把握写、钞本的复杂面貌、内在关系等内容仍具备较大的探索空间。有鉴于此,本文结合两种日藏白文无注本的具体研究,指出要分别从文献形态和文本形态两个方面进行考察,拟出“写钞无注本”、“写钞注本”、“刻本无注本”、“刻本注本”四个概念,并得出“白文无注本是注本之底本”这一观点,以期对《文选》写、钞本的研究思路与现象展开全新思考。

关键词:白文无注本 横向并列关系 四个概念 注本底本

梁昭明太子萧统编纂《文选》,本为三十卷,殆至唐时李善作注,一析为二,故成六十卷。自此之后,白文无注三十卷本逐渐失传,萧统《文选》原貌亦不可知,学界颇以为憾。近代以来,敦煌、吐鲁番写卷和日本汉籍进入国人视野,有关《文选》的写、钞本颇多,而白文无注古钞三十卷本尤为珍贵。它们不但为了解早期萧《选》原貌与后世刻本的底本情况提供相关依据,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还向学界提供了一个“白文无注本”的视角,足以成为重新梳理写、钞本与刻本之关系的独特切入点。

一、白文无注写、钞本概貌

今天学界所说《文选》“白文无注古钞三十卷本”,实际是一个系统分类之概念。这些写、钞本或出于敦煌、吐鲁番,或是日本旧藏,均为残卷、白文无注,故统称为“白文无注古钞三十卷本”系统。换言之,学界至今仍没有发现一部能够完整反映萧统编纂原貌的三十卷本白文《文选》^①,因而更显上述白文无注

^①在刻本系统中,明代王象乾《文选白文》,及日本江户、明治时期据王象乾本翻刻的《文选》白文刻本,并非承袭于萧《选》旧貌,故不属于本文“白文无注三十卷本”的讨论范畴。

写、钞本之价值。

在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文选》白文无注本,基本收录在饶宗颐先生所编《敦煌吐鲁番本〈文选〉》一书,其中英藏 S3663、法藏 P2554、P4884、P2707、P2543、P2542、P2658、P3778、P3345,涵盖《啸赋》《剧秦美新》《典引》《阳给事诔并序》《褚渊碑文》及若干诗篇。此外,德藏 MIK III 520 号则存有《羽猎赋》《长杨赋》《射雉赋》《北征赋》《东征赋》《西征赋》部分白文残片^①。俄藏 Дх18967 号《马汧督诔》残片亦存有白文^②。这些残卷虽有一定数量,但皆零散而不成体系,而且抄写背景十分模糊,为研究者带来一定的困难。同时,学界对残卷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几个重要的注本上,对白文无注本的关注较少。如法藏 P2528、P2527 李善注本、俄藏 Φ242 号佚名注本、日本永青文库单注本等,傅刚《〈文选〉版本研究》、罗国威《敦煌本〈昭明文选〉研究》《敦煌本〈文选注〉笺证》、富永一登《唐钞李善单注文选残卷考》、冈村繁《永青文库藏〈敦煌本文选注〉笺订》等均进行了介绍和研究。

而在日本方面,据阿部隆一《本邦现存汉籍古写本类所在略目录》介绍,日本现存《文选》古钞本有二十七种之多,傅刚先生《文选版本研究》一书对其中若干有价值的古钞本如观智院本、三条家本、冷泉家本、西园本等展开过详细比勘与介绍。在这些数量众多的日藏写、钞本当中,存在不少白文无注本残卷,如藏于猿投神社之正安本、弘安本(卷第一)、上野本(卷第一)、冷泉家本(卷第二)、书陵部本(卷第二)、观智院本(卷第二十六)等等^③。其中又有两种本子,尤其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种是日本宫内厅藏九条家本二十一卷^④,存卷最多,有昭和十三年(1938 年)东方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吉川幸次郎博士拍摄之照相本,后来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据照相本制作了复印本,日本学界研究用力颇多,研究成果丰硕。因条件

①饶宗颐编:《敦煌吐鲁番本〈文选〉》,中华书局,2000 年;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 年;荣新江:《德藏吐鲁番白文本〈文选〉校录(摘要)》,《百年敦煌文献整理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册)》,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2010 年,第 433 页。

②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俄罗斯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敦煌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第 17 册,第 304 页。对该残片的认定可参金少华:《敦煌吐鲁番本〈文选〉研究》,浙江大学 2008 年硕士学位论文,最新成果可参氏著《敦煌吐鲁番本〈文选〉辑校》,其绪论部分列有敦煌、吐鲁番写卷中白文本与注文本的详细缀合目录(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33-36 页)。

③本文涉及日藏古钞文献有: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杨守敬旧藏古钞本,上野精一氏旧藏本、日本宫内厅藏九条本,皆由傅刚先生提供,特此致谢。

④九条本现存二十二卷,其中第十四卷重,故实为二十一卷。所缺卷第五、六、九、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三十。

所限,中国学者仅有傅刚教授作过专门研究^①,实则此本文献价值极高,值得深入研究,是写、钞本研究中重要的比勘文献。

除九条本以外,还有一种被中国学者称为“古钞本”的二十一卷本,经清代学者杨守敬著录介绍并过录,而为中国学者所知。此本为杨守敬于日本访书时据森立之《经籍访古志》访得,著录于杨氏《日本访书志》。杨氏随后将其影写回国,受到当时学者如黄侃、高步瀛、傅增湘等先生的重视,在他们的《文选》校勘中均加以参考利用,对其文献价值均给予极高评价^②。但由于条件所限,此本流传不广,故学界了解不多,更未能展开深入研究。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传抄文本主要在私下流传、未能公开,另一方面则因为《文选》版本研究在当时尚未开展,学者们仅用于校勘,对于写、钞本的文献价值以及依据写、钞本研究萧统《文选》原貌的学术要求尚未有充分认识。这种情况持续到了现在,但当今的学术研究趋势已发生变化,《文选》版本研究,尤其是写、钞本研究已经较为深入,学术界对此本的认识和研究仍未能开展,这对于通过写、钞本研究萧统《文选》原貌,以及把握写、钞本与刻本间的关系,自是一大遗憾。

整体来看,现存《文选》白文无注写、钞本多是残卷,唯有日藏九条本及杨守敬带回的二十一卷本,距萧统三十卷本仅差九卷,因此这两个抄本所具有的价值,是别的写、钞本所不能取代的。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如果能够重视这两个日藏白文本,并结合其它白文残卷展开研究,则有助于学界进一步探索《文选》版本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如:早期写、钞本与萧统三十卷本间的关系,诸种写、钞本之间的关系,写、钞本与刻本间的关系等等。

二、日藏白文无注本及相关写、钞本研究现状回顾

展开白文无注古钞三十卷本《文选》的研究,离不开前人对《文选》版本的研究工作。而前人的研究工作,多集中于刻本系统中的李善注本与五臣注本原貌的探讨,及部分写、钞本的校勘整理。

(一)写、钞本研究的起步

《文选》版本的早期研究多集中在刻本领域的李善注本^③,以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胡克家《文选考异》、近代日本学者斯波六郎《文选诸本的研究》

①研究成果为《日本宫内厅藏九条本〈文选〉研究》一文。见傅刚:《文选版本研究》(增订本),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司,2014年。

②该古钞本二十一卷,经杨守敬发现后,是否全部进行了过录,需分别讨论,可参下文。

③五臣注的研究亦有学者关注,如游志诚:《敦煌古抄〈文选〉五臣注》(《昭明文选学术论考》,台湾学生书局,1996年);赵奉蓉:《从三条家本〈文选〉看〈文选集注〉之编纂及价值》(《四川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此外还有旧注研究,如王立群:《从蔡母遂注看唐写本至宋刻本〈文选〉注释的演变——〈文选〉注释研究之一》(《文献》2004年第3期);刘志伟:《李善注〈文选〉底本与旧注本关系试探》(《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为代表。他们的观点是现行李善注本从六臣注本中抄出,世无单行李善注本。这一观点随着更多早期《文选》版本的发现而遭到了否定。北宋国子监本(即现存最早的单行李善注刻本)、日藏《文选集注》(反映唐写本中的李善注)、敦煌残卷(如永隆本中的李善注)等新材料的出现,帮助后来研究者在推翻旧说的基础上,将《文选》版本的研究继续向前推进。这一时期的研究代表包括傅刚先生《文选版本研究》,日本学者富永一登《唐钞李善单注本文选残卷考》、冈村繁《文选之研究》。前者在掌握大量《文选》版本的基础上,推翻了“世无单行李善注本”一说,指出单行李善本一直就有存传。后两者则充分利用敦煌吐鲁番残卷、北宋国子监本与《文选集注》,梳理了李善注面貌的变化。由此,中日学者也分别提出了善注版本源流的想法,结论可归为两类:“单线传承式”和“复线传承式”。“单线传承式”的代表学者为斯波六郎。他认为《文选集注》“最存李善本之旧”,在校勘过程中发现后世刻本不同《集注》者,一律以《文选集注》本为是。森野繁夫则进一步发展斯波六郎先生的观点,猜测李善注刻本的底本乃从《文选集注》中抽出,加以补充订正而成^①。“复线传承式”则推冈村繁先生。他的观点与其师斯波六郎先生不同,反而强调“集注本李善注与现存版本李善注之关系就不是以往所认为的那种单线上的前后关系,而毋宁说是复线的、各处不同系统位置的关系。又就李善注的承传过程而言,它并非是由完整向不完整的脱落方向延续,而毋宁说是由简素向繁复的增殖方向发展”^②。傅刚先生则指出,尽管斯波六郎与冈村繁两位先生的异文分析结论都比较片面,但仍赞同冈村繁先生提出“应改变以同一单线的前后传承关系考察《集注》本(还应包括其他写本、抄本)与刻本间的关系”的观点,“现行刻本的善注并不一定是李善原貌,而抄写本虽时代较早,但也仍然有可能是改变过了的善注”^③。这些研究已经超越刻本材料,纳入写、钞本文献,在试图还原《文选》注本原貌这一问题上继续推进,是值得钦佩的。

尤其值得说明的是,傅刚先生在《文选版本研究》一书中,按“写本”、“钞本”、“刻本”三个类别,详细介绍了16种唐人写本,5种日藏古钞,这是国内首次较为系统地对《文选》写、钞本文献进行整理,覆盖面广,信息量大。也正是在掌握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傅先生提出当代学者研究《文选》的立足点和切入点,即要充分了解写本和刻本这两个不同阶段中的李善注和五臣注的不同特征,充分认识到刻本与写本之间的关系,刻本与刻本之间异同的产生原因^④。这是一个鞭辟入里的意见,对敦煌、吐鲁番及日藏白文无注写、钞本的研究,也

①[日]森野繁夫,段书伟译:《关于〈文选〉李善注——集注本李善注和刊本李善注的关系》,见俞绍初、许逸民主编:《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中华书局,1998年,第1027页。

②[日]冈村繁著,陆晓光译:《〈文选集注〉与宋明版行的李善注》,见《文选之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69页。

③傅刚:《文选版本研究》(增订本),第139页。

④傅刚:《文选版本研究·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页。

当在此立足点上展开。

(二)白文无注写、钞本研究的展开

具体到《文选》白文无注写、钞本的研究,由于是新见材料的缘故,且有些藏在台湾、日本等地,因此中日学界的研究进度并不一致。总体而言,学界普遍存在研究方法偏于传统校勘、关注问题过于分散的现象,并导致杨守敬的古钞二十一卷本长期缺乏应有的关注。

关于日藏白文无注写、钞本的研究,日本学界展开很早,重要的本子皆经过整理并出版,像日本京都大学的训点语学会《训点语与训点资料》,曾长期刊登小林芳规等学者对猿投神社正安本的过录与研究成果。当然,使用频率最高的白文无注本,在日本学界仍推九条本,相关成果也最多,如斯波六郎《九条本〈文选〉解说》、中村宗彦《九条本〈文选〉古训集》、池渊质实《九条本〈文选〉研究序说》及系列校勘记、佐竹保子《九条本〈文选〉的识语的检讨》、陈珮《九条本所见集注本李善〈上文选注表〉之原貌》^①。在这些成果中,日本学者采用的仍然是传统的目录校勘之法,将其与后世刻本进行校勘,为后世刻本寻找异文来源,同时由于这些写、钞本上还载有音读训读与校勘记语等内容,所以日本学者还会结合本国《文选》传习史与训读方法加以讨论。除了九条本,还有一个“上野本”,日本学者也有所利用,如斯波六郎、中村宗彦都运用到了上野本,且斯波六郎先生认为其优于九条本:“如果对上野本作一个精查的话……在保存旧貌这一方面显然更胜九条本一筹。”^②上野本现藏于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而这个上野本,其实就是杨守敬古钞二十一卷本中的第一卷。该卷由杨守敬转赠(或售)于日本朝日新闻总经理上野精一氏,后来在昭和十八年(1943)被认定为日本国重要文化财产。此说出于日本学者芳村弘道教授,杨氏与上野精一氏交情颇好,芳村教授手中藏有杨守敬所赠上野精一氏《邻苏园帖》可证。大约因此,杨氏最终又将此卷转赠上野氏^③。此外,猿投神社正安本、弘安本(卷第一)、冷泉家本(卷第二)、书陵部本(卷第二)、观智院本(卷第二十六)也

①[日]斯波六郎著,李庆译:《九条本文选解说》,《文选索引·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日]中村宗彦:《九条本〈文选〉古训集》,风间书房,1983年。[日]池渊质实:《九条本〈文选〉研究序说》、《九条本〈文选〉校勘记(一)(二)(三)》,广岛中国学学会编《中国学研究论集》,2000年10月-2003年4月。[日]佐竹保子:《九条本〈文选〉の識語の検討》,《东北大学中国语学文学论集》1999年第4号。陈珮:《九条本所见集注本李善〈上文选注表〉之原貌》,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编:《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二期),中华书局,2011年。

②[日]斯波六郎,李庆译:《九条本文选解说》,《文选索引·附录》,第5-6页。[日]中村宗彦:《日本古抄本〈文选〉卷一管见》,《大谷女子大学纪要》1981年12月第16-2期。

③傅刚:《从〈文选序〉几种写、钞本推论其原貌》,《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第50页。

均被纳入到训点的角度进行了观照^①。不过在上述日本学界的丰硕研究成果中,写、钞本的“白文无注”特点并没有被充分揭示出来,这可能与当时的研究学者对上野本、九条本属于白文无注系统的性质尚存疑虑有关。这个疑虑同样存在于古钞二十一卷本,下文将会涉及,暂不赘述。

而在国内,从白文无注的角度对《文选》版本加以研究的学者同样并不多见。

就敦煌吐鲁番出土的白文无注残卷,应以王立群先生《敦煌白文无注〈文选〉与宋刻〈文选〉》一文为重要尝试。该文抓住“白文无注”的特征,根据“敦煌的异文没有超出李善与五臣注二家本的异文之字”这一结论,推定敦煌本(或者其依据之底本)是早于李善、五臣本的版本,指出该敦煌白文无注本当是《昭明文选》三十卷本的较早面貌。王先生强调敦煌白文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它能够证明《文选》正文的某个字应该是什么,而是通过它能够说明《文选》正文甚至注释的变化原因。这才是敦煌白文本的真正价值所在^②。

而对日藏白文无注写、钞本的研究,则当推傅刚先生,除早期《文选版本研究》这一专著对日藏古钞进行介绍之外,还有一些单篇论文,对白文本加以介绍和研究,包括《日本宫内厅藏九条本〈文选〉研究》、《日本猿投神社藏〈文选〉古写本研究》、《日本宫内厅藏古写本〈文选〉卷二研究》^③等。整体来看,他因占有中、日材料之全面,又有刻本研究为基础,用力最勤,关注最久,成果也最多;就杨守敬二十一卷本的研究来说,也是当代少数的关注者之一,且在前人成果上有所发明。2000年以来,由于域外汉籍研究的兴盛,有更多的学者亲见诸多日藏古钞,因而有关《文选》日藏古钞的单篇论文也逐年增多,如徐华《日本时

①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训点语学会《训点语与训点资料》(1960-1962年),第14、16、18、21辑对猿投神社正安本进行了过录并展开训点情况的研究。冷泉家本则收入日本冷泉家时雨亭文库编的《冷泉家时雨亭丛书》第八十三卷,其中有后藤昭雄的解题,朝日新闻社,2008年。随着该本的公布,学界的研究也多了起来,如西崎亨:《时雨亭文库藏〈文选〉卷第二声点考》、《〈文选〉卷第二时雨亭文库本宫内厅书陵部本对校译文稿》,《女子大國文》2010年第1期、第9期。陈翀:《冷泉家时雨亭文库藏旧钞本卷二》,《中国学研究论集》2012年第12期。渡边さゆり:《关于冷泉家时雨亭文库藏〈文选〉卷二中的训点》,唐炜译:《敦煌学日本学(续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又有,山崎诚:《〈文选〉卷第二宫内厅书陵部藏“菅见记”纸背解说》,广岛大学文学部国文学研究室编:《镰仓时代语研究》第7辑,武藏野书院刊。而花房英树《解题文选赵志集白氏文集》则讨论了观智院本,八木书店,1980年。

②王立群:《敦煌白文无注〈文选〉与宋刻〈文选〉》,《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③傅刚:《日本宫内厅藏九条本〈文选〉研究》,《文选版本研究》(增订本)。傅刚:《日本猿投神社藏〈文选〉古写本研究》,张伯伟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三辑),中华书局,2007年;又,《日本宫内厅藏古写本〈文选〉卷二研究》,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编:《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三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雨亭文库藏古钞本《文选》卷第二校异举要》、王玮《日藏观智院抄本《文选》叙录》。^①正是有此前赴后继的探索,才让国内关于白文无注本的研究局面得以逐步打开。

(三)古钞二十一卷本的研究现状

接下来着重讨论杨守敬白文无注古钞二十一卷本的研究情况。这是一个价值不逊于九条本但鲜有人问津的本子。它的最早著录见于日本学者涩江全善、森立之《经籍访古志》卷六。该书单独介绍了第一卷的情况。这第一卷,便是前文所说的“上野本”。除此之外,杨守敬还发现二十卷本,于是在《日本访书志》中分别对“第一卷”与“二十卷”进行了著录并讨论。上述两本书均介绍了该古钞本的基本面貌,并通过与刻本的比勘,进行了性质判断。后来杨守敬将其影写回国,归于故宫博物院,现存于台湾“故宫博物院”。二十一卷本带回国后,颇受当时学者重视,徐恕、向宗鲁、黄侃、高步瀛、傅增湘等先生均有所过录或引校,当时学界以为世间仅有此一残本,所以直接称为“古钞本”。^②

屈守元先生《跋日本古钞无注三十卷本《文选》》一文,第一次较为系统且详细地介绍该古钞本的情况,包括著录题跋与抄写时间、异文及标记旁注、刊布时间^③。屈先生将古钞本系列归纳为“无注三十卷本”,置于诸版本之首,评价十分之高,并提出:“《文选》的古钞无注三十卷本,即属渊源于隋唐者。它的抄写时间,早晚不过在十三、四世纪之间,那都无关紧要了。”^④而且,该本可贵之处亦在于其典籍古式给我们留下了极为难得的校勘资料。

上世纪九十年代,傅刚先生发表《关于古钞《文选》残二十一卷》^⑤,第二次系统地介绍该古钞本及发现傅增湘过录相关异文的经过。据傅刚先生文中介绍,他于1994年在北京图书馆看书,发现傅增湘先生曾于1914年10月和11月两次以古钞本与胡克家刻本对校,并以胡刻本为底本过录了古钞本异文。据屈守元先生言,古钞本归台湾后,现大陆仅有他尚存一通临写本。这是因为他并不知晓傅增湘亦有过录。可见,当时使用该古钞本的频率之高,可能远超今人想象。傅刚先生对该古钞本做了较为详细的讨论,提出古钞本无论在篇目次序、格式,以至篇目文字上,都有许多与刻本不一致处,可纠正刻本以恢复萧《选》旧貌处不少。鉴于当时的客观条件,这篇文章也遗留了一些问题,比如该古钞本文体分类是否有“难”的问题。傅先生的另一篇文章《从《文选序》几种

①刘跃进、刘宏主编:《现代学术视野下的《文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②黄侃著,黄延祖重辑:《文选平点(重辑本)》,中华书局,2006年。高步瀛撰,曹道衡、沈玉成点校:《文选李注义疏》,中华书局,1985年。

③该文见于《昭明文选杂述及选讲》及《文选导读》,收录于赵福海主编:《文选学论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后收录于《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中华书局,1998年。

④屈守元:《文选导读》,巴蜀书社,1993年,第125页。

⑤傅刚:《关于古钞《文选》残二十一卷》,《文学遗产》1997年第6期;后收录于《文选版本研究》一书中,作《关于近代发现的日本白文无注古钞三十卷本《文选》》。

写、钞本推论其原貌》，充分使用了这个古钞本，并结合其他写、钞本的异文进行讨论，是一个努力探讨恢复萧统旧貌可能性的精彩尝试^①。

台湾学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也有所涉及，游志诚先生《昭明文选学术论考》一书论及《文选》诸版本，以为“日本古钞无注三十卷本，当在集注本之后，且为士人传写之本”^②。观点有所不同，但这种差异并不影响对古钞本及其底本的性质判断。可以理解为，游先生是就该古钞本本身做出的判断，而大陆学者侧重于追溯其底本的渊源。此后，时光荏苒，直到2015年，台湾学界再度对其加以关注。台湾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何维刚发表《杨守敬藏日本古钞〈文选〉之类目、注记与异文——以“赋”类为讨论重心》，清理了古钞本的类目及旁注标记，并选取了赋类异文加以讨论，得出“古钞本基本上近于五臣系统，但有仅合于国子监本者，亦有与今本全然不同者”的结论^③。对校的本子包括国子监本、奎章阁本、正德本、陈八郎本、明州本、胡刻本，基本为后世刻本系统。因此，若能结合更多早期的写、钞本，并扩展到二十卷中其他异文，或能得出更为全面的结论。

整体来看，针对古钞本的专门研究较少，研究意见也并不统一。不过对古钞本加以利用的现象，近年来也在逐步增加。学界在审视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它重新进行了利用，如刘跃进先生《文选旧注辑存》及相关成果便利用到了该古钞本，将二十卷本称之为“室町本”^④。又有一些硕士、博士的学位论文，在研究《文选集注》之时也提到了这个古钞本，如邹明军《古钞本〈文选集注〉残卷研究》、童岭《隋唐时代“中层学问世界”研究序说——以京都大学影印旧钞本〈文选集注〉为中心》、王翠红《古钞〈文选集注〉研究》。后二文将该本直接等同于九条本，均称“杨守敬《日本访书志》所谓‘《古钞文选残本》二十卷’即日本学界所谓的‘九条本’”^⑤，则混淆了九条本与杨守敬古钞本。这也说明条件所限，学界对古钞本的认识仍停留在已有介绍与著录信息，其性质、面貌、异文及与其他写、钞本关系等内容仍有较大的探索空间。

①傅刚：《从〈文选序〉几种写、钞本推论其原貌》，《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此文也引起其他学者的讨论，如力之：《关于日本古钞白文本〈文选序〉“略以时代相次”之“略”——兼论以此本所出为李善分卷前的三十卷本说难以成立》，《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②游志诚：《敦煌古钞〈文选〉五臣注》，《昭明文选学术论考》，第56-57页。

③何维刚：《杨守敬藏日本古钞〈文选〉之类目、注记与异文——以“赋”类为讨论重心》，《书目季刊》2015年第3期。

④刘跃进著，徐华校：《文选旧注辑存》，凤凰出版社，2017年。

⑤邹明军：《古钞本〈文选集注〉残卷研究》，四川师范大学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童岭：《隋唐时代“中层学问世界”研究序说——以京都大学影印旧钞本〈文选集注〉为中心》，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编：《古典文献研究（第十四辑）》，2011年，第94-95页。王翠红：《古钞〈文选集注〉研究》，郑州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52页。

回顾以往研究状况,可以发现真正以白文无注本为切入视角,对日藏写、钞本展开系统研究的成果比较少,而对杨守敬所携带归国的二十一卷本作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学者,更是屈指可数,早期仅有屈守元先生与傅刚先生两家。当代学者,则多取以著录提要、校勘刻本、辑存文献,使用情况较为复杂,讨论问题较为分散,尚缺乏细致而深入的系统整理与研究。

三、推进白文无注本研究的两点思考

通过对《文选》白文无注写、钞本的留存情况和研究现状的分析,我们一方面欣喜于探究萧《选》原貌的目标正在被一步步逼近,另一方面也发现前进的路上仍存在一些值得梳理的现象。又因写、钞本的复杂性,而造成系统研究白文无注本的困难局面,也亟待崭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一)将写、钞本进行系统化研究的可能性

近世发现的《文选》写、钞本,无论是白文无注本,还是注本,均呈现出诸多不同于刻本的特征,再加上传抄背景的模糊,因而形成复杂的局面。即便就日藏白文无注本而言,要对其进行系统化研究也是难乎其难。

首先需要对白文无注写、钞本的复杂性进行充分的预估。无论是敦煌吐鲁番残卷,还是日藏古钞,它们都表现出明显的“层累”特点,但文本层次叠加的原因很难明了;所见本与其底本之间的关系又存在不确定性;时代判断尤其困难。譬如,就杨守敬的二十一卷本而言,关于其抄写年代的判断方法,森立之、杨守敬大多是凭纸质、笔法书风、抄写字体、墨光等内容来下推断,并没有充足的材料和证据,可以确切证明其及底本的年代。再有,杨守敬的二十一卷本,实际应严格区分为一卷本和二十卷本。二者不但抄写时间不同,其抄写笔迹、目录行格、书籍装帧形制及异文特征都有很大不同。发生这个误判的原因在于:前人在使用古钞本的时候未能亲见上野本(即第一卷的原本),而仅仅使用了杨氏过录本,故没能注意到第一卷与二十卷本所存在的差异。这一现象也引出了杨守敬对古钞本是否进行全部过录的问题。二十一卷本中的第一卷,即日本学界所称“上野本”,现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其实是一个过录本,装帧形式已由卷轴装改为经折装。而后面二十卷,原本即是折叠装帧,现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的二十卷也是经折装,因此无法从装帧形态进行判断。由于一卷本和二十卷本的纸张样态不同,也有可能二十卷本是原本,杨守敬并没有对其进行影写。这也是考虑到如果二十卷本为过录本,则原本或仍在日本,但自杨守敬发现后到目前为止,日本方面不见更多信息。只能说,如此问题暂且阙疑,以待新材料的发现。

其次,在尝试构建写、钞本的系统,又需要对不同写、钞本之间的关系进行细致的考虑。写、钞本之间的关系更多呈现为横向并列关系,不一定如刻本系统那般,呈现出纵向传承序列。这点西方校勘学家早有论述:“现存的印本往往形成一个遗传序列,在这个序列中每一版都承袭前一版;而所有作品的现存

钞本之间往往只是并联关系,每一个都是独立承袭原本,或者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其他钞本。”^①正如前述学界对善注面貌提出的“单线传承式”与“复线传承式”的不同判断,正是基于《文选集注》、敦煌吐鲁番残卷的异文情况而产生的争论;再如日藏九条本的丰富识语,正反映出平安时期菅原家、藤原家、大江家三家博士官在同一时期互相参校抄写《文选》这一现象。

这个横向并列关系的判定,同样有助于把握敦煌吐鲁番残卷与日藏白文无注本的关系。敦煌吐鲁番出土的部分残卷可判定为六朝到唐朝期间所抄写,如法藏P2543、P2528、P2707、P4884等。但是,像上述可确定时间段的残卷毕竟有限,大部分残卷的抄写背景十分模糊,因而对异文的理解及把握与日藏写、钞本之间的关系带来一些困难。譬如颜延年《阳给事诔并序》一文,敦煌残卷中恰有法藏P3778与英藏S5736可资参考。从抄写字迹、样式可证两个残片完全出自二人之手,其中俗字、内容与九条本、古钞本亦是有同有异。例如“宜自尔先”句,P3778“自”作“乎”,九条本、古钞本、S5736仍作“自”;又如“狐续既降”句,P3778“降”作“隆”,九条本、古钞本、S5736仍作“降”;但如“路无归轡”句,却是P3778、九条本作“归轡”,古钞本作“皈轡”。诸如此类的异文现象,不如暂且理解为横向的并列关系,即承认敦煌吐鲁番残卷与日藏古钞之间分享了一些共时的异文特征,这相较于纵向的传承关系,更具解释的灵活性。那么,也正是在与敦煌吐鲁番残卷的对比过程中,凸显了日藏文献特有的传习过程与特征。国内学界在使用日藏白文无注《文选》的时候,基本做法是借他邦旧物,以关照本国传统,往往忽略了日藏文献本身所携带的日本国传习痕迹。其实《文选》写、钞本自唐宋之际便在中日两国的各自传承中分道扬镳。今天可见的日藏《文选》,无论是九条本,还是古钞本,皆历经日人的多代传习,日本博士官会根据所见注本对白文本进行校改。而这些校改痕迹,自然不会出现在敦煌吐鲁番残卷之中。换言之,就目前材料来看,敦煌吐鲁番残卷,正是研究日藏白文无注本一个绝佳的参照系。

由此看来,面对面貌复杂的白文无注写、钞本,以整理刻本版本为主的传统校勘学,已然无法满足对其的研究需要。合理分析两个重要的日藏白文无注本,即九条本与古钞本的关系,尝试对其进行系统化研究,正是一个难以用传统的刻本研究方法展开研究的要点。九条本识语所反映的菅原家、藤原家、大江家互相参校《文选》的现象,意味着日本博士官各自传习的写、钞本之间呈现出一种并列的关系,因而在对其进行时代判断时,也未必能够建立起一个前后传承明确的版本谱系。而在此横向并列关系中,写、钞本不但无法构建出按时代先后排序的谱系,彼此还共享了一些异文特征,更绝的是部分共享的异文

①[英]W.W.格雷格著:《底本原理》,见苏杰编译:《西方校勘学论著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2页。

在后世刻本中又消失了。这一切看似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纵向关系的方法并不一定适用于横向关系的描述。凭借某个关键异文便能确定刻本早晚的方法,未必可适用于写、钞本的时代判断,因而系统化的工作便举步维艰。加之抄写的背景模糊,写、钞本披露出来的异文,无论有无实质意义,数量庞大、性质不明。正是基于此,如何科学、有效且合理地处理大量的异文,系统梳理写、钞本之间的关系,需要学界进一步展开探讨。

(二)探寻白文无注本的研究视角

上一点是从写、钞本这一文献形态的角度展开的思考,而就文本内容来说,其“白文无注”的特征,又是一个超越以往刻本研究领域的范畴。目前学界普遍从注本形态与异文特征来理解白文无注本的面貌,并借此考察唐宋之际,从写、钞本到刻本的演变过程。对此,下文有几点补充看法。

1. 分清《文选》的文献形态与文本形态

综合《文选》不同的写、钞本,可以提炼出两组关系:

一是写、钞本与写、钞本之间的关系,这可以反映异文在早期写、钞本中的产生问题。这是就文献形态而言。

二是白文无注本与注本的关系。这组关系,在梳理完成之后,可以进一步延伸到刻本领域,从而为考察萧统《文选》原貌提供线索。这是就文本形态而言。

上述两组关系需要区分考虑,但又相互勾连,对第一个关系的透彻理解,有助于顺利展开对第二个关系的充分认识。为此,本文特拟出四个概念:“写钞无注本”、“写钞注本”、“刻本无注本”、“刻本注本”。

“写钞无注本”指的是以写、钞本为形态特征的白文无注文献,如敦煌吐鲁番白文残卷、日藏冷泉家本、观智院本、九条本、杨守敬古钞本等。

“写钞注本”指的是以写、钞本为形态特征的注本文献,如《文选集注》、敦煌永隆本、敦煌单注本、日藏三条家五臣注本。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推《文选集注》。

“刻本无注本”在本文特指直接源自萧《选》原貌的刻本无注本文献,在《文选》版本史上无对应例子。明代王象乾《文选白文》并非直接承袭三十卷本系统,不属于本文关于白文无注本的讨论范畴。日本江户、明治时期据王象乾本翻刻的《文选》白文刻本,同样不属于本文讨论范畴。由此可知,要想沟通写、钞本与刻本的关系,由于缺少这一环节,若直接讨论“写钞无注本”与“刻本注本”的对勘异文,跨度颇大,得出的结论可能未必合理,故需要增加一个过渡环节,即借助“写钞注本”《文选集注》作为桥梁。换言之,需从文本形态入手,而非文献形态入手,方可较好地解决文献形态演变的问题。

“刻本注本”则是以刻本为形态特征的注本文献,如李善注《文选》尤刻本、胡刻本,五臣注《文选》陈八郎本、朝鲜正德四年本,《六臣注文选》建州本、赣州本,六家本《文选》明州本、韩国奎章阁本等。《文选》版本的研究重心基本集中

于这个领域,体现为对李善注本与五臣注本的研究,具体成果可参本文第二部分“研究现状回顾”。

有鉴于此,本文尝试提出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展开对日藏白文无注写、钞本的研究,当先自“写钞无注本”始,进行“写钞无注本”之间的比勘,即九条本、古钞本、猿投神社正安本、弘安本等白文无注写、钞本之间的比勘。次之,展开“写钞无注本”与“写钞注本”之间的比勘,即上述白文无注古钞本与《文选集注》的比勘。接着,展开与后世刻本的比勘,逐步梳理,依次把握特征;而在将写、钞本与刻本进行比勘时,更应充分考虑写、钞本的复杂性,兼具共时性与历时性的考虑,甚至在无法为写、钞本进行精确定位的情况下,则暂且进行相似特征的归纳。

此处举一个例子,即古钞本中文体分类有“移”无“难”的情况。是否存在“难”体堪称《文选》文体分类讨论之最。据傅刚先生的研究成果,萧统编纂《文选》之际曾参考任昉《文章缘起》分类而设立“难”类^①,但是否意味着隋唐时期流传的写、钞本一定会出现“难”体,恐怕未必。写、钞本时期的传抄情况十分复杂,再加上该古钞本有“移”体,更令人难以轻易对古钞本的情况下结论,不好说无“难”体之底本的时代便晚。

先从文献形态入手考虑这个问题。

在写、钞本系统中,“难”体的依据最早出现在《文选集注》,其次是九条本。这两个本子被认为近于李善注本系统,《文选集注》则直接以李善注本为底本。

在刻本系统中,“难”体的最早依据其实见于五臣注本系统。把“难”列入《文选》文体,目前可见的材料也以南宋的讨论为最早,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王应麟《玉海》与章如愚《山堂群书考》所引《中兴书目》,所列《文选》各类文体均包括了“难”体。这些著录与五臣注陈八郎本的刊刻时间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是较为同步的,这说明南宋人的说法可能有前人材料或刊刻文本为依据,而游志诚先生之所以把敦煌单注本归之于五臣注本,或与此判断有关。

这样看来,五臣与李善都有关于“难”体的证据,无法说明问题,那么再考察文本形态。

无注本系统中,九条本有“难”体,而古钞本无“难”体。而在注本系统中,最早的依据来自《文选集注》,巧的是“难”体下有一条注文——“诘问之”,出自陆善经。考虑到《文选集注》中的李善注对此没有解释,加上敦煌单注本也没有特别说明,这三个现象使我们可以初步推测早期写、钞本对“难”体的忽视现象。那么,陆善经对“难”体的注释,便别有意味。事实上,陆善经本今虽不传,但它在后世其他刻本中可能留下一些痕迹。据《文选集注》中案语显示,江淹

①傅刚先生比较了任昉《文章缘起》所分文体与萧统《文选序》及《文选》实际收录文体的情况,提出“萧统文体观受到任昉的影响”这一看法。参氏著:《〈昭明文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83页。

《杂体诗卅首》之序文,是根据陆善经本载录的,同样情况还见于屈原《离骚经》的序文。这可证陆本对其它写、钞本及后世刻本产生的影响。再者,《文选集注》案语还表明陆善经本与五家本分享了不少共同的异文,二本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一致性。如此一来,陈八郎本、朝鲜正德四年本这两个五臣注本保存“难”体,或是受到了陆本的影响。

这个例子旨在对上文所说研究思路进行展示。按照传统的研究思路,我们会比较倾向于根据“难”体的有无,来推定萧《选》旧貌,并借此判断写、钞本底本的时代早晚。然而,经由文献形态与文本形态的分析,我们却发现“难”体在后世刻本中的呈现,可能从陆善经注生发而来,由此提出了另外的问题,如陆善经注本与五臣注本的关系。这个分析过程虽然会十分缓慢,但有助于我们逐步剥离表象、推导结论、逼近真相。

综而言之,通过抓住两组关系四个概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此前学界在考察《文选》的文献形态演变这个问题上具有一定局限性。《文选》版本的出发点是白文无注本,若能抓住这一源头,往下追索各写、钞本的异文产生情况,及随着注文的产生而发生的分卷情况,则便于理清从写、钞本到刻本这一演变过程的面貌,也可顺利地考察萧统《文选》原貌。

2. 重视“白文无注本是注本之底本”现象

按照上述思路,对白文无注本展开研究的第一步应当局限在写、钞本领域。但是,这些材料有限、零散、背景模糊,可反映的现象很多,但都难以找到确切的结论。因此,就我们目前掌握的文献材料,只能马上进入第二步,即就现有的零散白文本与注本系统进行比勘,通过判断其与哪个注本更接近,来推测白文无注本的底本。因而,将九条本、古钞本与《文选集注》、善注刻本、五臣注刻本展开对勘顺理成章。

但是,第二步的校勘过程与结果,容易给人造成一种模糊的导向,即混淆了无注本与注本的前后关系,甚至得出“无注本从注本摘抄出来”的结论。不得不承认,这种结论有一定可能性。早期中日学界对九条本、古钞本的性质判断,都出现过这样的声音。如森立之《经籍访古志》对古钞本的讨论,斯波六郎、佐竹保子等人对九条本的讨论,都保留了这个结论的可能性。尤其,这两个本子的卷首都冠有李善的《上文选注表》,仿佛正是那摘抄的罪证。幸运的是,自杨守敬以来,经过屈守元、傅刚两位学者的研究,已从古籍旧式这一角度力证白文无注本之清白。日本学者如斯波六郎、山崎诚、陈翀,也较好地解释了冠有李善表文的原因,即与平安时代大学寮的《文选》研习方式有关。另外值得补充的是,日本文献也多次提到《文选》“三十卷”的情况。比如平安时期的菅原道真诗云“文选三十卷”,室町时代末期的菅原和长所著的《御注文选表解》钞本封面题为“三十抄”,均可证日本博士官直接承袭了三十卷的白文无注本系统。

因此,目前学界发现的几个日藏白文无注本,并非从注本摘抄而来,应当

可以成为定论。如此一来,一个符合事实、但往往被忽略的现象便需要被关注,即:白文无注本才是注本的底本。注本是从白文本衍生而来,这意味着不同注本系统所具备的特征,都可能统一于白文无注本系统。这个现象,有助于帮助我们对白文无注写、钞本的底本情况作出全盘考虑。

此处再举一个例子。九条本、古钞本、冷泉家本等白文无注本的异文特征较为复杂,有的近李善注本,有的近五臣注本,也有的近《文选集注》中的陆善经注本、《音决》、《钞》,甚至有的异文完全找不到依据。因此,学者们一般也得出了更加接近五臣注本,或者更加接近李善注本,但又参校他本的结论。这些结论乍一看呈现出一种矛盾的状态,既与李善注本、五臣注本相合,又与其不合,实在令人困惑。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联系到“白文无注本是注本之底本”这一关键点,则能豁然开朗。例如,九条本与李善注本的相近,并不意味着李善注本是九条本的底本,而是反过来,九条本才是李善注本之底本,又参校他本,如此二者方能呈现出相似之处,那些超出李善注本的异文,也能得到解释。因此,白文无注本正是作为后世注本之底本,而能将后世不同系统的各类注本的异文特征融于一体;继而,各类特征又被后来不同系统的注本所继承了。唯有存在分歧,才有可能制造分裂。而敦煌吐鲁番残卷早就反映,注本与无注本的相互影响在写、钞本时期便已形成^①。

从“白文无注本是注本之底本”这一现象出发,该如何严谨地表述版本之间的关系,也成为需要留意的要点。譬如通过异文研究,笔者发现古钞本整体上更加接近李善注本并如此描述的时候,仍然会造成前述错觉,即古钞本抄自注本。因此,较为稳妥的表述可以是:古钞本与善注底本相近。九条本同理。综而言之,日藏白文无注本在漫长的传习过程中与注本系统发生了相互影响。白文无注本系统的正文早就存在差异,源于此的注本系统则随着时间的推移,继承并形成了不同异文特征,加上正文与注文的相互影响,造成了目前所见的写、钞本的复杂面貌,也为学界的研究增加了不少难度。因此,为了深入考察《文选》的白文无注本,小心各种传统思维的陷阱,本文着重提出了以上两点思考。

【作者简介】高薇,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①这个问题拓展到注本领域,对注本的底本判断及参校情况也可以得到更全面的认识,比如学界关于敦煌永隆本《西京赋》的底本问题的讨论。这一点笔者将另撰文分析。